

协同治理视域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侦查协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俞保华

(广西警察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8)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44 条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作出明确规制。运用协同治理、府际关系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等分析框架进行剖析后发现, 目前该类犯罪制度侦查协作框架已经初步成型, 实践运行维度的协作模式也在不断创新, 但从效能角度来审视, 在信息共享、证据转换、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执行机制等维度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其深层原因为各类协作困境并非单纯操作层面问题, 而是由体制条块分割、制度供给不足、技术适配滞后、激励约束失衡等多重深层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为此, 需要从构建打破数据壁垒的信息共享平台、统一证据转换的标准与程序、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执行机制等层面,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侦查协作体系进行优化和创新。

关键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侦查协作; 证据转换; 行刑衔接; 协同治理

Realistic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 in crimes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YU Baohua

(Guangxi Police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28, China)

Abstract: Article 144 of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licitly stipulates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 An analysis employing analy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theory,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heory reveals that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 concerning such crimes has preliminarily taken shape, and collaborative models at the practical operational level are undergoing continuous innovation. However,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ness,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evidence conversion, and the execution mechanism of cross-regional and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are that the various collaboration dilemmas are not merely issue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e deep-seated factor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upply, lagging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and imbalanced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and innovate the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 system for crimes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 by constructing an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that breaks down data barriers, unifying the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evidence conversion, and improving the execution mechanisms for cross-regional and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Keywords: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 evidence conversion; administrative-criminal linkag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专项课题(编号: 2023GAYB070)

通信作者: 俞保华(1973—), 男, 广西警察学院副教授, 硕士。E-mail: yubaohua@gxjcxxy.edu.cn

收稿日期: 2026-01-22 改回日期: 2026-04-09

引用格式: 俞保华. 协同治理视域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食品与机械, 2026, 42(5): 92-96.

Citation: YU Baohua. Realistic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 in crimes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Food & Machinery, 2026, 42(5): 92-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44条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作出明确规制。由于该罪严重侵害群众生命健康权、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其犯罪形态的复杂性、隐蔽性和跨域性,决定了侦查协作是打击此类犯罪的必然选择,但犯罪链条的全环节蔓延倒逼侦查协作,这类犯罪多形成“种养殖—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流通”全链条网络,呈现家族化、团伙化特征,且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如非法添加新型化学物质、利用网络直播带货售假等。因此,单一部门很难覆盖全链条监管,仅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较难精准锁定上下游犯罪团伙,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检测机构等部门的协作则能够实现线索共享、全环节溯源,从而可以有效破解全链条打击难题。此外,部门职能的互补性决定需要侦查协作,公安机关具备侦查权但缺乏食品专业检测、行业监管经验,市场监管部门熟悉行业动态却无刑事侦查权限,检测机构拥有技术优势但无法开展执法取证。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如刘艳红^[1]分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的法律适用;赵艺聪^[2]论证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曹荣刚^[3]探讨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刑事治理;程轶欢^[4]分析了围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侦防对策,但目前尚未见专门从侦查协作机制维度进行深度探讨的报道。从理论维度看,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责任协同、资源整合与共治共享,契合食品犯罪跨部门、跨区域治理需求;府际关系理论聚焦部门间权责划分、利益协调与执行机制,为破解协作梗阻提供分析工具,目前研究多侧重法律适用与侦防对策,缺乏从协同治理视角对侦查协作运行逻辑、深层困境及制度优化的系统性探讨,文章拟由此切入展开研究。

1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的现状观察

从多起食品安全事故来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不仅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而且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该类犯罪呈现出链条长、隐蔽性强、跨区域等突出特点,决定了单一部门较难实现有效打击,而侦查协作作为破解该类犯罪打击难题的关键路径,其依托多部门协同形成监管与侦查合力,已逐步构建了多层次的工作体系。

1.1 制度建设的协作框架初步成型

近年来,中国立足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持续强化侦查协作制度供给,形成“顶层政策引领+部门机制衔接+地方创新补充”的制度体系,为协作开展提供了坚实规范支撑,但仍存在部分衔接不畅问题。首先,顶层政策设计确立全链条监管框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领域协同治理,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聚焦从农田到餐桌全生命周期监管,提

出21项具体协作措施,界分各部门责任边界,完善信息共享、通报协查、联动处置等工作机制,填补了贮存、配送等环节的协作监管空白,为跨部门、跨环节侦查协作提供了顶层遵循。同时,公安部持续部署“昆仑”专项行动,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作为打击重点,明确要求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四动”工作格局,推动侦查协作常态化、规模化。

其次,部门协作机制夯实横向联动基础。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侦查协作关键环节,建立针对性工作机制,强化横向协同效能。在省级层面,甘肃、四川等地检察机关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构建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协作配合机制,明确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调查取证支持、人员交流培训等内容,尤其针对规模化、链条化犯罪线索设立专门移送通道。在基层实践层面,四川省攀枝花市创新建立联席会商机制,将每月25日定为“信息共享日”,统筹汇总各部门监管线索,针对疑难案件启动“多方会诊”,形成行政监管、刑事侦查、司法认定的闭环协作机制。此外,检察监督与侦查协作的衔接机制逐步完善,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大案件,为案件定性、证据标准、侦查方向提供专业支撑,以此破解协作中法律适用方面的部分难题。因此,从府际关系理论看,顶层政策与部门机制的衔接,本质是纵向权责配置与横向协同规则的制度化过程,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基础制度框架^[5]。

1.2 实践运行维度的协作模式不断创新

在制度指引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从分散作战向协同共治进行转型,形成多部门联动、全链条打击、科技化赋能的运行模式,同时仍面临区域协同不足、专业能力不均等挑战。

首先,多部门联动形成合成作战格局。公安机关主动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行政部门,建立日常巡查+联合检查兼专项打击的立体化协作模式。在日常监管中,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检查时民警同步排查犯罪线索,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农资抽检时,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固定证据,实现监管与侦查的无缝衔接。其次,科技赋能提升协作的智能化水平。各地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破解传统协作中线索发现难、侦查效率低的问题。杭州市公安局开发“民生卫士”数字应用,整合1 000亿条行政刑事数据,构建肉类食品犯罪智能预警模型。此外,技术检测协作层面,构建了行政部门检测+第三方鉴定+专家论证”的多元实施模式,以此解决新型有毒有害成分认定难题,如张家港市侦办“减肥话梅”案时,邀请专业志愿者开展盲检,联合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成分分析和毒物鉴定,最终明确新型化合物双辛酚丁的有毒有害属性。因此,数字治理理论强调技术赋能治理效能、数据驱

动治理升级,科技化协作模式是数字治理理论在食品犯罪侦查领域的具象应用,是传统侦查协作向智慧协同转型的关键抓手。

2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存在的提升空间

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的制度建设及其运行实践来看,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效能导向来审视,仍不同程度存在信息共享不畅、证据转换梗阻、跨域协作乏力等提升空间,导致很难适配全链条打击需求。

2.1 信息共享的多重壁垒

信息互通是侦查协作的基础,当前跨部门、跨区域信息共享存在多重壁垒,并由此导致数据滞后的问题,制约线索挖掘与案件侦办效率。首先,部门间信息孤岛现象比较突出。公安机关、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均有各自的监管数据系统,但因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意愿不足、安全顾虑等因素,数据资源较难有效整合。其次,信息共享的范围与深度不足。现有的协作多局限于早案件线索通报方面,而食品生产溯源数据、检测报告、企业信用信息、物流运输记录等关键数据共享不足,导致很难实现对犯罪链条的全环节溯源。再次,信息传递存在滞后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实时信息推送机制,主要依靠人工报送、定期会商等传统方式传递信息。

对此,通过深刻分析发现,多重信息壁垒的形成并非单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制度、技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① 体制根源。从府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行政体系呈现典型的条块分割特征,各职能部门权责边界固化,形成了独立的部门利益圈层,基于自我保护思维形成数据“不愿共享”的利益壁垒,同时缺乏统筹全域数据治理的专属权责主体,数据治理责任虚化、推诿现象频发。② 制度根源。食品领域数据共享的顶层制度供给不足,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安全规范与共享边界界定规则,无强制性数据共享机制,现有数据互通完全依赖各部门自愿配合,缺乏制度约束力。③ 技术根源。各部门数据系统建设时间、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架构异构、数据接口不兼容,叠加各部门数据安全防护标准参差不齐,跨部门数据整合、互通的技术成本与安全风险较高,阻碍数据资源融通复用。

2.2 证据转换的标准不一与程序障碍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顺畅转换是行刑衔接的核心,当前证据转换存在标准模糊、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影响案件定性与打击效果。首先,证据转换标准不统一。行政监管部门的检测报告、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行政证据,因取证主体、取证程序、检测标准与刑事证据要求存在差异,较难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如南阳市卧龙区公安机关最初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未检出涉案糖

果中的新型有毒成分,后经高校专业检测才明确成分属性,暴露出行政检测与刑事鉴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6]。其次,证据转换程序存在障碍。部分行政监管部门取证时未遵守刑事证据收集规范,如未全程录音录像、扣押物品清单不规范、证人证言形式要件缺失等,导致行政证据因合法性瑕疵无法转换。再次,新型有毒有害成分的鉴定难题加剧证据转换困境,第三方检测机构与刑事鉴定机构的技术衔接不足,较难快速出具符合刑事诉讼要求的鉴定意见。

对此,从深层根源进行研判,证据转换阻滞问题重要原因是三重壁垒。① 制度原因。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存在证据规范二元化特征,行政证据侧重监管合规性,刑事证据侧重司法合法性、严谨性,二者取证标准、证明要求差异显著,且缺乏刚性的证据转换衔接约束机制,规则适配性不足。② 专业壁垒。行政监管执法人员缺乏刑事证据规则、司法取证规范的系统培训,取证过程较难兼顾刑事诉讼要求,而公安侦查人员缺乏食品检测、行业监管、产品溯源等专业知识,对证据核心要素把控不足,双向专业认知鸿沟导致取证不规范、证据衔接失效。③ 技术更新滞后。新型食品非法添加物、有毒有害成分迭代速度快、隐蔽性强,检测鉴定技术更新滞后于犯罪手段升级,专业鉴定机构资源稀缺、技术衔接机制不畅,较难快速出具符合刑事诉讼标准的合法鉴定意见。

2.3 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执行机制缺失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跨区域特征显著,当前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缺乏常态化执行机制,协作效率低下、责任划分模糊。① 缺乏统一协调机构。跨区域案件主要是借助临时会商、专项行动等运动式协作。② 协作责任划分不明确。跨区域案件的管辖权争议、线索移送责任、协查义务等缺乏明确规定,部分地区存在“各扫门前雪”“推诿扯皮”现象,甚至因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案件协查。③ 执行保障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考核激励与问责机制,部分部门协作积极性不高,导致出现协作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同时,跨部门专业协作不足,公安机关缺乏食品检测、行业监管专业知识,行政部门缺乏刑事侦查规范认知,从而导致协作中存在沟通障碍。

因此,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这类问题实质是府际治理失衡和制度激励约束失效导致。① 府际权责失衡。现行属地管理治理模式与食品犯罪跨域治理需求存在天然冲突,跨区域案件的管辖权、协查责任、办案经费、人力保障等权责划分模糊,地方基于区域利益形成保护主义壁垒,跨域协同治理权责不对等、利益不均衡。② 激励约束机制失效。侦查协作成效未纳入部门刚性绩效考核体系,缺乏正向激励与反向问责机制,形成“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负向工作氛围,部门主动协作动力严重不足。③ 运动式治理路径依赖。长期依赖专项整治、临

时联动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未建立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协作执行机制,导致协作行为碎片化、短期化,很难适配持续性、链条化的食品犯罪治理需求。

3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的优化策略

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在侦查协作机制方面存在信息共享的多重壁垒等问题,需要立足全链条的打击需求,将技术赋能、制度完善、机制创新作为重要抓手,构建信息互通、证据互认、协作高效的侦查协作体系。

3.1 构建能够打破数据壁垒的信息共享平台

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在信息共享方面存在的多重壁垒,需要将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构建统一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以此确保能够打破部门与区域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治。首先,统一数据标准。由省级以上食安办牵头,整合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检察、检测机构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建立涵盖食品生产、流通、检测、违法犯罪记录等全维度数据库,统一数据采集、存储、传输标准。其次,明确共享范围与权限。采用分级授权管理模式,明确不同部门的信息访问权限,实现案件线索、检测报告、溯源数据等关键信息实时共享,同时建立数据安全保障机制,防范数据泄露。最后,健全信息推送与会商机制。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每月通报工作动态,重大事项随时会商,同时依托平台实现线索自动推送、风险智能预警,提升信息传递时效性^[7]。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该优化举措深度契合数字治理理论“技术赋能、数据驱动、精准治理”的核心逻辑,通过全域数据资源整合、标准化治理、智能化应用,彻底打破传统行政体系的条块分割格局,推动治理模式从分散式信息孤岛向一体化数据共治进行转型,从而为侦查协作提质增效提供核心技术支撑^[8]。此外,从前瞻创新层面,引入区块链技术搭建食品全链条溯源存证系统,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运输、质量检测、线上线下销售等全环节数据进行上链存证。依托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的技术特性,实现食品全链条数据真实可查、全程可溯、永久留存,有效解决跨区域数据真实性存疑、证据流转瑕疵等问题,为跨区域证据互认、全链条溯源打击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推动食品监管与侦查协作智慧化升级。

3.2 统一证据转换的标准与程序

针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在证据转换层面存在的标准不一与程序障碍,应当以行刑衔接规范化为目标,明确证据转换标准与程序,破解证据衔接梗阻难题。首先,制定统一的证据转换规范。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食品犯罪证据转换指导意见,明确行政证据转换为刑事证据的范围、标准与程序,对检测报告、现场笔录等常见行政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标

准作出具体规定,确保符合刑事诉讼要求。其次,建立专业技术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与高校、权威检测机构建立长期协作,组建专业技术咨询团队,针对新型有毒有害成分开展联合检测与鉴定,最终通过对结果的闭环管理提升证据的科学性^[9]。同时,规范检测流程,统一检测标准,确保行政检测与刑事鉴定结果的一致性。再次,强化证据收集规范培训。定期组织行政监管部门执法人员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开展联合培训,重点讲解刑事证据收集规范、检测标准等内容,提升跨部门证据收集能力,如通过引导公安机关固定聊天记录、销售数据等证据,精准认定犯罪金额,以此有效提升危害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效能^[10]。

对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多元主体规则协同、行为同步、资源共享。统一食品犯罪证据转换标准与程序,本质是消除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的规则差异、专业壁垒,统一多元治理主体的执法司法标准,实现行刑证据体系的协同统一,构建规则一致、流程顺畅、权责明晰的行刑协同治理格局^[11]。此外,从前瞻创新层面观察,可以搭建“食品犯罪智能证据辅助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嵌入食品犯罪全品类取证规范模板、证据合法性审查标准、常见证据瑕疵预警模型。系统可自动辅助基层执法、侦查人员规范固定各类证据,实时筛查取证程序瑕疵、证据要素缺失等问题,智能提示补正要点,从源头降低证据瑕疵率、杜绝非法证据,大幅提升基层办案规范化水平,实现证据审查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

3.3 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执行机制

基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维度存在的执行机制缺失这一实际,需要在立足跨区域犯罪打击需求基础上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执行机制,并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保障。首先,设立专门协调机构。在省级食安办下设侦查协作协调办公室,统筹协调跨区域、跨部门案件侦办,负责线索移送、管辖权确定、联合侦查组织等工作,借鉴桂湘黔环“三省坡”协作经验,建立跨区域风险会商与联合执法机制^[12]。其次,明确协作流程与责任。制定跨区域协作操作规范,明确案件线索移送时限、协查义务、证据互认规则等,避免推诿扯皮。同时,建立协作责任清单,将协作配合情况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再次,完善考核激励与问责机制。对协作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对协作不力、查处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同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跨区域案件督办机制,确保全链条打击。此外,推广跨省“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执法模式,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尽量避免,并以此提升协作执法的效率及社会效果^[13]。

因此,从理论方面来审视,该优化路径严格契合府际

关系理论权责对等、利益协调、制度约束的核心原则,通过明确各区域、各部门的协作权责、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破除地方利益壁垒,有效平衡属地管理与跨域治理的矛盾,构建起“权责清晰、利益均衡、执行有力、监督到位”的现代化跨域协作治理体系,实现府际协同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对于研究的前瞻创新,需要推动搭建全国性食品犯罪侦查协作大数据智慧平台,打破省级区域数据壁垒,实现全国范围内食品犯罪线索实时流转、案件协同办理、执法资源智能调配、风险全域预警。推动侦查协作模式从传统的人工对接、临时联动、属地作战,向智能化、常态化、全域化的智慧协同升级,彻底摆脱运动式治理依赖,实现食品犯罪跨域治理的长效化、精准化、现代化。

综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侦查协作面临的信息壁垒、证据梗阻、跨域协作失效等多重困境,实质是协同治理机制缺位、府际权责配置失衡、数字治理赋能不足的综合治理难题。破解新时代食品犯罪全链条治理难题,必须以协同治理、府际关系、数字治理三大理论为核心指引,立足实务落地性与发展前瞻性双重维度,通过构建一体化数据共享共治平台、规范化行刑证据转换体系、常态化跨域协作执行机制,全方位整合多元治理资源、破除治理壁垒、补齐制度短板、强化技术赋能。推动食品犯罪治理模式从传统的分散作战、被动应对、运动式打击,向协同共治、主动预判、常态化治理全面转型,持续完善食品安全侦查协作治理体系。对于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优化部门权责配置、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升级智慧监管体系,不断提升食品犯罪协同治理效能,切实筑牢食品安全法治防线,从而能够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市场秩序稳定。

参考文献

- [1] 刘艳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法律适用解析[J]. 人民检察, 2024(4): 39-40.
LIU Y H. 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cases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J].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2024(4): 39-40.
- [2] 赵艺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24: 23.
ZHAO Y C. Research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and harmful food[D].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024: 23.
- [3] 曹荣刚.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治理的优化路径[J]. 食品与机械, 2025, 41(8): 66-69.
CAO R G. Optimization path for criminal governance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oxic and harmful food[J]. Food & Machinery, 2025, 41(8): 66-69.
- [4] 程轶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预防对策研究[D].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5: 17.
CHENG Y H. Research on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crimes of production and sale of toxic and harmful foods[D]. Beijing: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2025: 17.
- [5] 高永久, 杨龙文.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央地关系协调: 价值意涵、演进思路与发展动向[J]. 山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5): 39-45.
GAO Y J, YANG L W. Coordination of China's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value meaning, evolution of ideas and development trend[J].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49(5): 39-45.
- [6] 汪宇堂, 胡皓. 南阳卧龙: 破解食品安全技术鉴定难题[N]. 检察日报, 2024-09-18(2).
WANG Y T, HU H. Wolong district, Nanyang City: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technical appraisal of food safety[N]. Procuratorate Daily, 2024-09-18(2).
- [7] 日照市校园食品安全专题风险会商会议召开[J]. 食品工业, 2024, 45(8): 174.
Special meeting on campus food safety convened in Rizhao City [J]. The Food Industry, 2024, 45(8): 174.
- [8] 张邦辉, 林旭凌. 全球数字治理的理论困境、根源解析与中国方案[J]. 理论探索, 2025(6): 76-86.
ZHANG B H, LIN X L. Theoretical dilemmas, root causes and China's Solutions of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J].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2025(6): 76-86.
- [9] 王鑫. 管理评审在食品检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实施路径探讨[J]. 轻工标准与质量, 2026(3): 81-83.
WANG X.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anagement review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food testing laboratories[J]. Light Industry Standards & Quality, 2026(3): 81-83.
- [10] 胡炜宸, 余德厚. 危害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缺陷及其完善路径[J]. 食品与机械, 2025, 41(11): 41-44.
HU W C, YU D H. Defects of the criminal law on food safety and its improvement[J]. Food & Machinery, 2025, 41(11): 41-44.
- [11] 赵泽睿. 从技术到程序: 数字法治政府协同治理的法治创新[J]. 行政法学研究, 2025(6): 134-149.
ZHAO Z R. From technology to procedure: legal innovations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digital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J].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25(6): 134-149.
- [12] 王宏.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J]. 中国食品安全, 2025(10): 86-89.
WANG 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Internet-based food safety supervision[J]. China Food Safety, 2025(10): 86-89.
- [13] 李妍. 食品领域畸重处罚的执法逻辑及反思[J]. 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 2025(11): 140-142.
LI Y. Law enforcement logic and reflection on excessively severe penalties in the food sector[J]. Price Supervision and Anti-Monopoly in China, 2025(11): 140-142.